

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汪涛



2018 年伊始，美国宣布将对进口太阳能板和洗衣机征收关税，在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调查报告后，特朗普又宣布将对这两种产品进口实施严厉关税。这些措施表面上看针对所有相关进口，但实际上明显针对中国。这可能只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第一步。

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都可能难以避免。中美分别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进口国，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重一半。自竞选开始，特朗普就表现出强烈的近商主义倾向，称将致力于削减贸易逆差、重谈贸易协定。去年美国虽然没有启动针对中国的全面贸易战，但考虑到双方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基本面一时难以改变，美国当局对贸易逆差的态度，以及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担心，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将难以避免，并且长期存在。虽然今年美国经济将强劲增长，但由于中期选举和特朗普政府其他内政外交的困扰，贸易摩擦升级可能性大为增加。

不过，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已经显著降低。货物贸易出口占 GDP 的比重已从 2007 年的 32%降至 2017 年的 18%，出口相关行业就业占比也明显下降。经常账户顺差与 GDP 之比也于 2007 年的 10%以上降至去年的 1.3%。这与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口需求减弱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格局的调整。

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将甚于美国，中国应尽量避其锋芒、积极应对。美国对中国

出口占比仅为 8.4%，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比超过 20%。虽然美国征收进口关税会推高国内价格，但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在其消费品篮子构成中占比非常低，对经济影响有限。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机械设备、关键零部件等，相对更难以取代，中方反击的措施局限于农产品

之类。

因此，在确保核心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中国应该尽力拖延和避免贸易战，并加快国内经济结构转型、拓展市场、分散风险。过去一年多，中国继续支持全球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扩大开放，允许汇率升值，增加从美国的

进口并积极与美国各界沟通。中国在促进经济转型的同时，积极推进区域性贸易协议，开拓其他市场，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拓展新兴市场的贸易。中国企业也逐步在海外布局，以绕过一些针对中国出口的制裁措施。近期，中国可以增加从美国的进口，特别

是农产品、生物科技产品、交通运输设备、IT 产品和知识产权产品，以降低双边贸易失衡。同时，可以进一步开放金融、保险、清算、医疗、知识产权服务和旅游市场。针对美国 301 知识产权调查，中国可以从促进国内创新发展的角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当然，如果美国继续对部分行业提高关税或进行制裁，比如家电、汽车零部件、家具等，中国可能也会作出相应、合适的反应，既维护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又相对克制、遵守世贸组织协定、避免摩擦升级。在必要的情情况下，不排除对美国农产品进口或在华企业出台报复性措施，同时继续协商谈判争取最大的利益。

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宜也不会被用作贸易战的工具。目前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水平，贬值会带来一定风险，可能会导致贬值预期升温，资本外流进一步扩大，并加大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波动。在弱美元的环境里，中国可能会允许人民币小幅升值，引导市场对人民币更加灵活的预期，降低单边压力。但为了防止升值过快导致中国处于被动地位，同时为将来美元可能的走强保留一定缓冲区间，升值步伐可能会低于美元贬值幅度。

中美贸易战可能会影响整个亚洲地区的贸易活动，但是少数经济体或将从中获益。韩国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经济体深度融入全球电子产品供应链，如果美国针对电子产品（其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采取措施，这些经济体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但中国出口的竞争对手可能受益，增加在美国市场的份额，越南就是典型的例子。

萨缪尔森的贡献

■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 邹至庄

论，好比 he 研究消费行为，用持久收入来解释消费，也用美国的经济数据来证实这个理论。而萨缪尔森则用数学的方法来分析经济理论，他从来不用统计的数据来证实经济理论。1941 年萨缪尔森在哈佛大学拿到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的基础》用数学的方法说明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理论。该书的内容包括静态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静态经济学理论的一个例子是当消费者的收入增加时，他们对各种货物的需求便会增加。动态经济学讨论经济行为发生的时间。好比当消费者的收入增加，他们对货物的需求在何时增

加。

经济学的的一个基本理论是人类的经济行为基于他们想要追求个人的最大幸福。弗里德曼利用经济数据来证实这个理论，而萨缪尔森用数学方法来分析这个理论，亦即用数学方法推导出这个理论的含义。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中，我们找不出任何统计数字，只找到经济理论的推导。但萨缪尔森研究经济学的范围甚广，包括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国际贸易、金融经济学等，在每个领域他都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论文。

萨缪尔森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动态经

济学。我举动态经济学的一个例子：当收入增加了，消费量便会增加。动态经济学说明收入增加后消费量在何时会增加。动态经济学的变数都是时间 t 的函数。好比消费量 C 是时间 t 的函数。动态经济学还可以用来研究一个变数和几个变数的时间关系，甚至几个变数和几个变数的时间关系。

动态经济学不但包括动态经济的模型，还包括利用动态经济模型来决定良好的经济政策。好比政府的一个重要经济政策是增加国民消费。政府可以用补贴来增加居民的收入，居民的收入增加后，消费量便会增加。再进一步的研究是，如何采取好的经济政策来

取得良好的经济效果。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假定一个目的函数来衡量什么是良好的经济效果。

美国一位著名的数学家 Richard Bellman 发现了一种数学方法，称为动态规划，可以用来求出最优的经济政策，来达到最优的经济效果。萨缪尔森是把动态规划引用到经济学的第一位经济学家。笔者发现，要求出最优的经济政策，我们不需要用动态规划，我们只需要用一个微积分的方法，亦即拉格朗日乘数便能解决 Bellman 用动态规划来解决的问题。经过多次讨论，萨缪尔森被我说服了，他也同意拉格朗日乘数能够用来求出最优的经济政策，并且是比动态规划更好的方法。关于这个结论，请读者参考我写的书：《Dynamic Economics: Optimization by the Lagrange Method》。该书封面的背面，记录了萨缪尔森承认拉格朗日乘数是比动态规划更优异的方法。

科斯经济学方法评述

在考察资产专用性对促进纵向一体化的作用过程中激发了科斯新的思考。科斯认为他在 1932 年 3 月和数理经济学家瓦西里·莱昂别夫关于双边垄断风险和一体化问题的讨论，使得他意识到调查企业之间的长期合约关系的重要性。科斯把焦点再次回到市场合约问题：当设备的专用性投资面临的风险低（买者转向其他生产者）时，一体化可以作为另外一种替代性手段来消除风险。科斯意识到市场中企业相互交易是需要成本的，而一体化是可以降低这种交易成本的手段；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尽管这个观点有待完善，因为除了企业内部生产以外，依然存在大量的市场交易。随后对通用汽车公司和 A. O. 斯密斯车体制造公司之间长期合作关系的考察，使科斯意识到资产专用性未必会带来企业的纵向一体化。他得到的一般性结论是：“存在着避免风险的‘许多合约手段’，用于避免只有一个买主情况下与资本投资相关的风险……A.O. 斯密斯工厂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这使得他放弃了从资产专用性角度来解释一体化或企业的存在的思路。科斯的观察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市场合约完全可以替代企业内部一体化的生产方式；二是专用性投资风险并不会导致一体化的形成。从资产专用性和企业一体化关系的考察中，科斯关于市场交易配置资源和企业内部交易配置资源两种方式的相互替代性的观点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什么情况下采用企业之间通过市场合约方式来组织生产，什么时候通过企业内部的合约关系来组织生产必然取决于何种生产方式对企业更有利，或何种形式更有助于成本的下降。科斯找到了两种机制之间的替代性关系，这离最终的答案一提出“交易费用”概念解释企业内部协调与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性关系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

科斯最终在 1932 年夏天的某个时候找到了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以及组织内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这两种方式并存的一致性解释的答案。即市场价格机制运行需要交易成本，交易是在企业内部完成，还是由独立的订约人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取决于“进行这些市场交易的费用与在组织（即企业）内部进行这些交易的费用的对比”。科斯关于企业一体化存在原因的多种理论解释中，最后想到了价

格机制交易成本这个为经济学家所忽略的因素，较为圆满地解释了企业存在性问题。科斯教授在理论构建中所利用的分析工具只涉及微观经济学的两个易处理的核心概念：成本和边际替代。理论假设现实性和易处理性的一致性在科斯企业理论中得到完美的诠释。

六、基于假设现实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内在联系

科斯在经验研究中所确立的现实性假设和提出的理论命题并非假设到理论的线性逻辑关系，而是呈现出整体性的特征，假设和命题都依赖于现象本身的调查与发现。科斯经济学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了解现实世界是如何运行的，而不能凭想象确立研究对象的理论假设。这和主流经济学重视数理形式逻辑演绎的研究方法不同，这意味着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现实性理论假设之间有内在的联系。

科斯在晚年对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予以了反思。在他看来，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其他相邻学科）本质上是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相分离的结果。他认为这种分离造成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他们所要分析的主体，以致他们的分析缺乏任何具体的内涵……交易的发生与特定的制度背景无关……有厂商而没有组织，甚至有交易而没有市场”。即这种分离使得经济学沉浸于理论演绎的方法，却忽视了对现实世界存在的各种制度如何运作进行正确考察。对此，科斯批评道：“经济学家的专业兴趣越来越专注于更加形式化、更技术化、数字化的分析。这种更形式化的分析越来越趋于一般化，它对经济体系谈得越来越来。”研究方法过于一般化的处理虽然看起来能更加容易地应用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但往往也由于忽略经济运行的具体制度背景而导致分析空洞化。他认为只有当对其他制度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经济现象时，对其他领域研究的扩张性研究才有意义。

造成这种分离的根本原因就是假设的非现实性。以消费理论为例，科斯认为理性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设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某个东西的（相对）价格上涨，对该物品的

需求量就会下降，我们只了解这么多就够了……并不需要假定人们是理性而且在追求效用之极大化”。效用极大化和相应的效用函数的构造虽然方便了数学的应用，但是却并不是一个现实性假设，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大部分人们都在设法追求极大化什么东西，除非我们指的是烦恼”。科斯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的批判涉及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问题。科斯认为经济学家的专长并不在于其独特的方法，而在于其特定的研究对象本身。

科斯在研究中发现组织或者制度的存在是基于节约交易费用的目的，而真实世界中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产权的界定对于资源配置的效率改进非常重要，因为“交易赖以发生的制度背景会影响对生产的激励和交易的成本，因此对经济学家而言，如果没有对制度背景进行具体说明就来讨论交换过程则毫无意义”。他认为关于其他社会体系对经济体系运行会产生影响，经济学家除了研究价格制定，还要研究“社会制度的运行，它们把企业、商品和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银行系统、国际贸易等粘联在了一起构成经济体系”。国际在诺贝尔奖演讲词“论分析的制度结构”中，科斯呼吁经济学研究对象应该是为主流所忽视的“决定交易过程的制度安排……因为这些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什么”。科斯认为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区别不应该是研究方法的区别，而是以研究对象为区别的。“如果研究对象是（区别学科）的主要因素，那么理论或方法很大程度上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即方法是为研究对象服务，不能忽略具体的制度背景考察，用一种空洞的方法去解构研究对象。基于假设现实性的研究方法要求对现实世界中的制度背景作细致考察。研究方内生于研究对象，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和制度为内在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共生关系，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对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并非无关紧要，恰恰是经济学研究对象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本身决定了经济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科斯教授一直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方法保持浓厚的兴趣，认为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两者的研究方法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经济学发展和其他自然科学发展的差距。在 2002 年美国穆

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合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他发表了题为“为何经济学将发生变化”的演讲。科斯谈道：“经济学具有某种静态的特征，它讨论的主体依然是亚当·斯密所创建的那些东西……但是……物理学现在讨论的文献并不一定是基于伊萨克·牛顿，化学也不一定要回到拉瓦锡，生物学也未必会回到达尔文。”科斯指出造成目前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依然要回到诸如马歇尔和萨缪尔森老一辈的经济学家理论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是在讨论价格的确定、企业规模等问题；在经验研究方面通常只是在既定理论框架下讨论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而他本人期待这种研究对象的变化，认为经济学要加强对包括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内的研究，帮助我们理解经济系统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而相应的经验研究也应该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而服务，即为了对交易成本有比较深入的讨论，需要“那些能真正改变我们看法的经验研究”。如果仅仅是以人类行为选择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会出现前面提到的种种弊端，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研究都会产生相当大的局限性，并最终妨碍人们对于支配经济现象内在规律的认识。从行为选择为重点研究对象的范式转换到以制度为重点研究对象的范式，及相应研究方法调整将大大改善经济学目前的这种形式多于内容、变化之间关系讨论多于内在机制研究的尴尬状况。

七、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罗纳德·科斯以现实性理论假设为核心的研究方法的一般特征，区别于逻辑演绎研究方法的三个本质性区别：一是现实性理论假设确立过程和以之为基础的理论命题提出并非单向的线性逻辑关系，需要以研究对象交易的实际运行制度的调查为基础。二是以理论假设现实性为基础所提出的理论命题是可以观察和验证的；理论命题的获得是一个反复证伪的过程。三是这种研究方法会要求对研究对象运行的具体制度安排进行考察；这决定了研究方法和理论假设的独特性而非统一性，特定的研究方法内生于

研究对象，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继承上来看，科斯教授基于理论假设现实性的研究方法实际上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研究传统，与亚当·斯密、马歇尔的研究方法一脉相承。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更强调的是归纳的研究，理论假设的确立和研究对象的详细考察密不可分，或者说现实性假设本身是正确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从制针工厂提炼出分工理论便是一种典型的归纳方法。科斯认为“马歇尔本人当然是一位伟大的经济事实收集者……他所掌握的事实信息显然令人敬畏”(Coase, 1975, p. 28)。科斯还引用马歇尔一处对于经济学与经济理论关系的论述，从侧面重申了他一贯强调的经济学必须直面现实世界的立场。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并不等价于经济理论：“理论是重要的，但它也只是正确的(proper)经济学的一小部分，我以为最糟糕的莫过于将理论经济学视为正确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对我而言是重要的……但是，对事实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同样重要……正确的这两个方面研究的经济学才是唯一结合好的经济学”。这表明了马歇尔本人在经济学研究中对事实本身研究的重视；这也是科斯本人的一贯主张。

从现实出发，考察真实世界约束人类行为制度运行及其与人类行为互动，进而改善人类的福祉，这是这些伟大经济学家的共同旨趣。科斯在巨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这种研究的必要性理由——价格机制的运行会产生交易成本，制度是作为节约交易成本而存在的，制度本身就是经济系统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由于人类经济生活并不是在假设的真空世界中展开的，对人类经济行为和政策作用的正确理解必须借助于人类所面临的现实约束来展开分析。经济学的进展有赖于斯。纯粹在演绎的道路上经济理论的发展虽然在形式上日臻完美，但只会将经济学带向黑暗的深渊，经济学家很容易掉入以想象杜撰故事的陷阱，开出不切实际的济世药方。理论的现实性和易处理性必须取得某种一致性，回归以现实性假设为基础的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学研究是一条光明大道。经济学家家中的智者罗纳德·科斯教授为我们指明了这一点。(完)